

## 开幕致词与闭幕致词

# 《21 世纪中国与日本》 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备委员会 中方主任王学珍在开幕式上的致词

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今天，《21 世纪中国与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隆重举行。首先我代表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以及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向到会的各位领导、学者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

中日关系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的发展，也关系到东北亚地区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深入地探讨下一个世纪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对中日两国友好相处，多方面的合作，促进世界和平是极为有利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学术研究价值。

中日两国关系不仅涉及两国，也是与东北亚格局密切相关的。只有深入地探讨 21 世纪东北亚格局，将中日关系置于这一格局中，弄清两国的地位与作用，才能使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

探讨中日关系时，不能表层地、单方面地进行，应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综合研究，即从政治（主要是国际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进行探讨，特别是从文化角度进行深层次研究，更有助于中日两国的相互了解与理解，只有这样，21 世纪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才能

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

只有回顾历史，从不同角度和不同领域探讨中日关系，才会对当前的中日关系有一个透彻的认识，也会对 21 世纪中日关系有一个科学的预见。有鉴于此，本次会议才确定了《21 世纪中国与日本》这样一个主题。

此次会议邀请了 4 位日本著名学者和我国 17 位著名学者作为主题报告人，阐述各自的见解。这些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颇有造诣，他们的报告和与会的各位学者围绕这些主题报告展开的讨论，将会给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增添光彩，使会议圆满成功。

我们对本次会议的期待是：通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对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进行展望，以此推进中日友好及中日文化交流；推动我校学者与日本学者的交流，进而扩大与加深我校与日本学术界的交往，推进我校日本学及与此相关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对日本的综合研究，进而推进中国的日本学研究。

最后，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本次会议的经费是由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资助的。这个基金是由日本有名的食品公司——卡乐 B 食品股份公司出资于 1994 年 4 月创立的。宗旨是资助中国的学者和有关科研机构开展对日本的研究，以增进中日学术和文化交流以及中日友好。在此，我们向卡乐 B 日本基金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大会圆满成功！

## 《21 世纪中国与日本》 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备委员会 日方主任松尾聪在开幕式上的致词

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日中两国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你们好！

我代表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本次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日方委员致词。

各位在百忙中特地来参加这次会议，在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从今天开始的《21 世纪中国与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北京大学的大力协助下，从一年前开始筹备的。今天终于隆重地举行开幕式，对日中两方的大力支持，我深表谢意。

我相信，开幕式之后的各阶段的报告与讨论，都会充满高水平的学术气氛。在此，我热切期待这次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们卡乐 B 食品股份公司一直不懈地努力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创办奖学金以及资助传统艺术等活动。前年 4 月有幸聘请北京大学几位学者作顾问，在他们的指导下，成立了支持中国日本研究的基金。这个基金以小规模地资助北京大学的年轻的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以及该大学的有关学术团体为主。

去年，作为该基金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建议召开一次讨论下一个世纪的中日关系的国际会议，并且开始了筹备工作。

1997 年香港将归还中国。人们预测，亚洲将要呈现出新的面貌，到底是什么样的面貌呢？现在需要从长远的观点展望日中关系

和人类共存的未来。

我希望从这个观点出发，中方的学者和日方的学者展开深入的讨论，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给这样的讨论提供更多的机会。

最后我希望承担下一个世纪的日中两国的人民以饱满的热情创造新的美好的世纪。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华 日本学会会长刘德有在开幕式上的致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

值此 21 世纪中国与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华日本学会表示热烈的祝贺。人类再过大约四年将进入 21 世纪，在这一重要时刻，中日两国众多的著名学者聚集北京共同就 21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进行讨论，我认为具有深远的意义。生活在当今世界 也就是 20 世纪将要结束的今天，我们究竟把怎样的中日关系带到 21 世纪，这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作为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中国和日本 发展长期、健康的睦邻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回顾过去 立足现在 展望未来 从而对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走向提出科学的预见，这是本次讨论会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如果这次讨论会在正确把握和对待历史的基础上，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深入讨论和研究 21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并且能为两国今后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而又健康的睦邻友好的关系提出积极的建议和方策，那将使这次讨论会不仅会结出丰硕成果，而且将大大促进中日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从而会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当然上述课题的探讨和研究，不能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中日两国。中日两国的关系必须而且也只能是放在世界的范围加以考察，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这次讨论会是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和日本的

中国学研究，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和增进两国学者间的友好和相互了解。而这一切必将为今后中日两国学术界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合作提供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如果没有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的资助以及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中国全国性学术团体的中华日本学会对于中日双方能切合时宜地在北京举行这样重要的学术活动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衷心祝愿讨论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 日本驻中国大使 佐藤嘉恭在开幕式上的致词

谷牧前国务院总理阁下，  
雷洁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阁下，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在以《21世纪中国与日本》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之际，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本次研讨会是以21世纪日中两国间的经济发展、21世纪的东亚政治形势、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等议题为中心，进行报告和讨论。被人们称之为亚太时代的21世纪的到来已是弹指一挥间，日本和中国为这个地区的繁荣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将会更加巨大。今年是战后51周年，也是以“历史为鉴，再度认识的第一年”，日中双方的著名专家汇聚一堂，就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面向未来”的讨论，我认为十分有意义的。再一次向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作出努力的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亚太研究中心、经济学院以及在资金方面提供帮助的卡乐B日本研究基金的各位有关人士表示敬意！

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距离“近”，双方的消息也能瞬间互通，处于一个高度信息化状态，所以日中双方相互间的深刻理解对正确捕捉对方信息，作出应答是十分重要的。我喜欢孔子说的“近者说，远者来”这句话，如何加深相互理解，发展新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对于两国，而且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来讲，

都是当今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说起这次研讨会主办地北京大学，我不由得想起曾在燕京大学执教，至今长眠在北大校园的已故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众所周知 斯诺先生 1936年作为西方记者首次进入解放区“，数年间的国共战争已经牺牲了成千生命。为发现真相所付出的努力，即使赌上一个外国人的生命也是不足惜的”，带着这种悲壮的决心，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导人对话，把鲜为人知的中国革命的实情和未来传达给世界人民。

60年前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们面对不同国籍和肤色的年轻的斯诺 没有沉默和暴力 而是对这位“近者”敞开胸怀进行对话 从而使不少接触到斯诺著作的“远者”对新生的中国产生了理解和共鸣。60年后的今天，从即日起开幕的研讨会也许时间有限，但我期待你们能够超越时间和语言习惯的不同，作为心心相连的“近者”自由阔达地交换意见。希望这个生产斯诺地召开的这次研讨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祝愿在座的各位事业蒸蒸日上。

谢谢大家！

## 《21 世纪中国与日本》 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备委员会 中方主任王学珍在闭幕式上的致词

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21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今天就要结束了。两天来，在中、日学者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大家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认真研究了日本和中国各自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探讨了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以及这一大趋势给中日两国提供的机遇和提出的挑战，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了中、日两国在未来世纪中应担任的角色和双方应有的关系。在讨论中，学者们就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多是学者们长期研究的心得，因而极有见地，使与会者深受启示。同时，大家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彼此切磋，从而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共识；即使是那些仍然存在的不同意见，也大大深化了研讨的层次，给大家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广阔空间。

朋友们：

再过四年，我们将迎来 21 世纪。关于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纪，全世界各国的政界、财界和学术界已经谈论得很多、很多。其中，一个最强的声音就是“21 世纪将是一个亚洲太平洋的世纪”。

本次国际研讨会的讨论也明确显示，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大势，有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为亚

太地区的两个主要大国，中国和日本在亚太时代中将获得极为有利的定位。但这一有利的定位，同时也极大地加重了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未来的亚太时代 应该是一个和平、进步、发展的时代 亚太地区就理应是这个和平、合作、发展时代大潮的潮头；而中、日两国更应是这个潮头的前锋。这个历史责任 决定了 21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应是一种在各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求得彼此最大限度的理解与合作的格局；同时以相互理解与合作，保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而保证中日两国各自的充分发展。

这是一个大题目 人类历史上无数经验与教训 要求我们回答好这个大题目，我们这次会议就是在作这个大题目。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日两国在下一世纪的发展与合作 贡献力量！

现在我宣布，《21 世纪中国和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圆满结束。

谢谢各位。

## 《21 世纪中国与日本》 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备委员会 日方主任松尾聪在闭幕式上的致词

各位来宾、各位先生：

请允许我在此次学术讨论会闭幕之际作一简单的致词。在这两天中，我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知识的兴奋，中日两国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共同出席这次会议可谓是一个奇迹。而且，中日两国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均极为坦率并极有风度地对 21 世纪的中国与日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将在中日友好历史上增添新的一页。我们并不是要通过这次讨论得出什么结论，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这次讨论来互相综合认识中日两国的状况相互启发勾勒出 21 世纪中国与日本的框架，在我们每个人的试验中引入新的视点，让其受到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新的论点的冲击，并对我们各自的基本模式加以修改，使其更加丰富。设计运营这样的知识氛围才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可以认为与此目标相适应，这两天的研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与日本时我们明确得知过去、现在的中日两国的各自经验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有着众多相互影响的积极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通过这两天的讨论，我对中日两国之间的距离如此接近感到十分吃惊。因此，中日之间的理解不仅会促进中日友好，而且对于中日两国各自进行长远的展望也有着切实的意义。我想通过这两天的讨论关于 21 世纪的中国与日本的新的框架、新的展望肯定已经出现在各位先生的头脑中。

21 世纪的中国与日本进行展望的尝试已经在今天、在这里，立足于一个新的纪元、新的地平线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能够让我对这个辉煌的尝试承担起支援的光荣作用，在此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对以王学珍先生为首的热心筹备这次会议、成功举行这次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的各位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最后，感谢出席并始终热心参与讨论的各位先生。祝出席此次会议的先生身体健康、事业发达，祝中日两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谢谢！

## 论 文

# 近代中日两国吸收 西方文化态度之比较

北京大学历史系 王晓秋

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和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近代以来始终是中国和日本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和实现近代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所苦苦探索与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使到 21 世纪，它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

近代中日两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上的差异，与两国近代化的成效关系甚大。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近代历史上几个实例的比较，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 一、近代初期中日两国吸收西方知识的比较

#### ——以汉译西书为中心

19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用汉文编译出版的各种书籍报刊，俗称汉译西书。

鸦片战争以后，有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办了一些新式书馆、报馆，翻译出版书籍、报刊。如英国伦敦会传教士 1843 年在上海开办的墨海书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1845 年在宁波设立的美华书馆等，都出版了不少汉译西书。清政府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聘用外国传教士翻译西书，如北京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出版了许多汉译西书。这些汉译西书大多采用中西学者合译的方法，一般是由西人将要译之书“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再“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然后由中国学者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译出初稿后，再由中国学者“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sup>①</sup>由于采取这种中西合作的办法，发挥双方之长，所以较能保证译书的质量，文字也相当通顺。

这些在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虽然对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科学知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中国强大的保守势力和传统文化的抵制下，收效不大。不料其中的一些书籍传到日本，却很快得到翻印或翻译，广泛流传，在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和文明启蒙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真好比墙内开花墙外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播的种，却在日本结了果。

19 世纪中叶以前，日本的西方文化知识主要来自长崎贸易的荷兰人和他们带来的荷兰文书籍，因此称为“兰学”。日本的兰学者虽然也翻译了一些荷兰文的科技地理书籍，但所获知识十分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幕末日本人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学习西方文化的需要。加上荷兰文相当难懂，即使是兰学者翻译起来也很吃力。译出的书，文字常常晦涩难读。然而，汉文的书籍却是很多日本知识分子都能阅读理解的。有些日本学者精通汉文的程度甚至不亚于中国人。所以汉译西书的传入对渴望了解西方新知识的日本人士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从已经翻译成汉文的西方书籍上吸收西方文化，对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日本知识分子是一条方便的捷径。因此，

开国以后,日本朝野人士通过中国商船、英美军舰以及亲自赴华贸易考察如 1862 年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筹各种途径 拚命购买收集汉译西书。20 世纪初,日本著名思想家吉野作造在追述 50 年前日本知识分子通过中日文化交流渠道吸收西方文化的迫切心情时描写道:“不仅中国新出版的书籍被立即带回日本 即使尚未出版的,也时常传述消息,使日本学者急切盼望。”<sup>②</sup>幕末有名的洋学家柳河春三在 1861 年出版的《横浜繁昌记》一书中 曾指出:“近今 英美两国人士 务修汉文 在香港、上海等处所刊汉文著述颇多。他列举了许多书名后遗憾地写道,可惜其中不少书自己尚未见到,“姑录耳闻 以备参考”。<sup>③</sup>

下面择要介绍一部分汉译西书传入日本后迅速被翻印或翻译出版的情况。

日本人最关心的地理类书籍中,有英国传教士慕维廉(M. Willian)的《地理全志》该书 1854 年在上海出版 很快就传入日本,1858 年有爽快楼刊印的训点翻印十册本。幕末著名学者盐谷宕阴在此书序言中认为“浏览三日,略足以瞭五洲之大势,则讲地理者,安得不以此为捷径焉哉。”<sup>④</sup>

美国传教士裨理哲(W. R. Quanterman 编著的《地球说略》,1856 年由宁波美华书馆出版。传到日本后,1860 年由洋学家箕作阮甫训点刊行。内容包括地球圆体说等总论和各大洲的图说。作为简明的世界地理入门书在日本很受欢迎。明治初年还一度成为学校的世界地理教科书,出现好几种日译本。还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 E. Coleman 的《联邦志略》介绍美国地理风土。1861 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1864 年日本就刊行了箕作阮甫的训点本。

医学方面书籍也是传入较早的汉译西书。如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H. Benjamin 关于人体解剖学的汉文译著《全体新论》,1851 年在中国广东出版,1857 年就由日本越智氏训点翻刻。合信的《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关于外科、内科、妇科与小儿

科的医学著作,1857—1858 年间陆续由上海仁济医馆出版,很快于 1858—1859 年就在日本刊行了翻刻本。

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W. Alexander)口译、中国学者王韬笔述的物理学著作《重学浅说》,1858 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1860 年就有了日本翻刻本。伟烈亚力口译、中国数学家李善兰笔述的天文学著作《谈天》一书,上海墨海书馆 1859 年出版,仅两年后,1861 年即由日本浪华福田家刊行翻刻本。他们两人合译的数学著作《数学启蒙》、《代数学》等书在日本也有翻刻本。

还有几种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启蒙读物汉译西书也在日本广泛流行。一种是英国传教士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1855 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该书共有三集,第一集是物理学,第二集是天文学,第三集是动物学。60 年代初由日本幕府的官方学术机构开成所翻刻,并加以训点。以后在明治初年又被多次翻印,作为学校的理科教材。另一种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 W. A. Parsons)译著的《格物入门》七卷,1868 年由北京的同文馆刊印,第二年就传入日本,并出版了训点翻刻本。

还有一种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L. James)编译,1864 年香港英华书院出版的《智环启蒙塾课》是一部中英文对照关于西洋科学知识的入门教科书,共分 24 类 200 课。传到日本后,1867 年首先由江户开物社出版了训点翻印本,训点者是柳河春三,书名为《翻刻智环启蒙》。此书在明治初年广泛流传,成为许多日本学校的教科书,出现各种版本。

在社会科学的汉译西书中,对当时日本政界影响最大的首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编译的《万国公法》一书。1864 年,丁韪良把美国学者惠顿的《国际法要义》翻译成汉文,称为《万国公法》。这部译稿由恭亲王奕訢委派总理衙门章京四人加以润色,1864 年由北京崇实馆出版。该书当年就传入日本,第二年由幕府开成所训点翻印。1868 年即明治政府成立这一年,《万国公法》同时有三个日译

本出版。明治初年,《万国公法》的各种节译、全译的日译本不下数十种之多。明治政府还把《万国公法》列为大学必修科目。东京、京都、神户与许多地方的学校也采用《万国公法》为教科书。《万国公法》的内容正是开国以后日本开展对外交涉所急需的国际法知识,因此受到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幕末思想家横井小楠认为《万国公法》是“各国交际答辨之道,是当今最流行之学问”。<sup>⑤</sup>明治初期,汉译《万国公法》被奉为权威经典,成为日本外交家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斗争的重要武器。大隈重信等日本官员都能熟练地运用《万国公法》中的知识,据理力争要求废除治外法权,使英法等国驻日公使们也感到大为惊讶。明治初年汉译《万国公法》里的词句在日本风靡一时,在各种布告、公文、上书以及政治家的笔记书信、僧俗各界人士的交谈中常常被引用。现代日语中的“权利”“义务”“自治”“主权”等汉字词汇都来源于汉译《万国公法》,可见此书在日本影响之巨大。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原来为了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而编译出版的汉文西书,往往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被中国知识分子所充分利用,甚至还遭到顽固派士大夫的攻击非议。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把学习西方文化斥为“以夷变夏”,大肆鼓吹“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sup>⑥</sup>有人还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统统起源于中国,对汉译西书不屑一顾。

然而汉译西书传到日本,却受到不同对待。在日本社会中被争相翻印、广泛流传,发挥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不少自然科学和地理历史方面的汉译西书成为日本幕府、各藩以至明治初年各地各级学校学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而汉译《万国公法》竟成为明治初年日本外交家与西方交涉、争取国家主权的重要武器,这恐怕是西方传教士们所始末料及的。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怪现象,恰恰反映了 19 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方文化